

作为北宋中晚期的重臣，刘摯跨越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和徽宗四朝，经历了北宋盛极而衰的全过程。刘摯从县令做起，官至宰相，历经宦海生涯的升降沉浮，度过了坎坷的一生。

从大运河边走出的北宋宰相刘摯

■林永香

北宋时期的宰相刘摯从大运河岸边走进北宋朝廷的视野。他治学严谨，才华横溢，但一生都在北宋中后期的动荡中度过。围绕着变法，他数度被朝廷罢官，历经宦海生涯的升降沉浮。



壹

大运河边走出来的宰相

刘摯(公元1030年—1098年)，字莘老，永静东光(今衡水阜城县码头镇西刘村)人。宋神宗时期，他任尚书左仆射、尚书右仆射，分别相当于首相和次相，所以人们习惯称刘摯为宰相。

刘摯的故乡西刘村在码头镇北大约二三里，与东光县城隔京杭大运河相望。

北宋时期属于东光。

刘摯的父亲刘居正一直鼓励他读书，并亲自教他，从早到晚都不间断。有人对他说：“您只有一个儿子，难道不能稍稍对他放宽点吗？”居正回答说：“正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才不可以放纵他。”

嘉祐四年(公元1059年)，刘摯高中

进士甲科，做了冀州南宮县令。他作为北宋中晚期的重臣，跨越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和徽宗四朝，可谓经历了北宋盛极而衰的全过程。刘摯在当时的政坛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在群贤毕集的宋中期，刘摯能从县令一直做到宰相，足可以窥见他的才能。

贰

宦海生涯 几经沉浮

熙宁四年(公元1071年)，王安石开始执掌政权，而且对刘摯非常器重，不断对他加以提拔。刘摯为人刚直，王安石拜相后推行新法时，刘摯并没有因为王安石对自己有恩，选择站在新法的一边。相反，他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认为新法有许多弊端，便上书宋神宗，陈述新法的弊病。总的说来，刘摯的政见是比较倾向司马光一党的。

宋神宗当时相信王安石，便把刘摯贬

到衡州监管盐仓。宋哲宗继位后，刘摯由丞相司马光推荐改任秘书少监，升侍御史。元祐元年(1086年)，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。北宋朝廷围绕变法形成的新、旧两党争论加剧，进而因地域、政见不同形成洛、蜀、朔三党。

以刘摯为首的北方派被称为朔党，他们主张吸取汉、唐以来的历史经验，对北宋社会实行逐步改良，反对暴变，比较推崇司马光

的政见。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，刘摯与其他两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。他的学术思想、执政理念在他的著作《忠肃集》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

元祐六年(公元1091年)，吕大防为左相，刘摯为右相，此时的刘摯达到了自己的人生顶点。后来，刘摯遭到吕大防一派弹劾而被罢相，接连又连贬四地，68岁时死于湖南常德。

叁

清正廉洁 不畏权势

刘摯为官清正廉洁，忠贞爱国。嘉祐四年(公元1059年)，他中举后任冀州南宮县令。此地赋税甚重，百姓生活艰难。为减轻百姓的负担，刘摯向上级奏请减少税赋，上级却弹劾他破坏规矩。刘摯不畏权势，一做到底，直接将此事上报朝廷，最终朝廷下令减少了南宮地区的税赋。减税之后，百姓收入增加了，都非常拥护他。因他的政绩卓著，刘摯与信都令李冲、清河令黄莘被称为“河朔三令”。

刘摯对人才选拔任用方面见解颇深。有一次，他在和宋哲宗的谈话中说道：“人才难得，贤能品行不一。性情忠厚而且才能学识有余，这是上等；才能学识不足但忠厚老实有余，这是次等；有才能而难以保持，可以借以成就事业，这是又次等；心怀邪念观望，随着时势而改变，这是小人，终不可以任用。”宋哲宗听后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你能这样用人，国家还有什么忧虑！”充分肯定了他的见解。

刘摯从最初任职到担任宰相，坚持独

立的见解，辨别邪恶，专意留心选拔人物，也从不接受拜谒请托。他自己的子弟亲戚做官，也全都让他们到吏部按标准进行选拔，从不以权谋私。

刘摯生活在北宋人才济济的鼎盛时期，很多在后世有大名声的人物都曾与他交往，苏轼、苏辙都曾与他有过诗作互答。苏轼写下《刘莘老》，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，足见两人交谊之深。南宋哲学家朱熹在刘摯去世近百年后，特地去到皇家名人堂为刘摯画像题诗。

肆

刘摯父子都曾出使契丹

自从宋真宗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，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，双方使臣每年都要踏上幽燕古道，在北宋开封与辽之间往复交流。宋朝屡次派出朝廷重臣出使契丹，如欧阳修、苏辙、王安石等，其中还有刘摯。

刘摯出使契丹是在元丰五年(公元1082年)，那一年他53岁，正在尚书礼部郎中任上。刘摯被派出使，给契丹国主拜年，当然这是双向的，契丹也派官员来给北宋皇帝贺新年。

刘摯是位忧国忧民的官员，刘摯由冀入燕，一路看遍北国风光。他在《城北》这首诗中写明了自己内心的忧愤：“六十万

兵闲饱死，谁怜山后八州儿。”“六十万兵”指的是北宋官兵，他们吃闲饭，没事干，可怜太行山北侧八州的老百姓们，至今盼望回归到北宋的怀抱。作为北宋官员，刘摯非常感慨朝廷白白养兵，却无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无奈。

刘摯是怀着不平之心完成了契丹之行的，而他的儿子刘跂多年之后也踏上使辽的路途。宋神宗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，刘跂和他的二弟刘蹈考中同榜进士，但因其在朝，他反倒一直在地方任职。刘跂这一生，身怀高才，学识非常渊博，集文学家、易学家、金石学家、书法家、古琴家于一身，

与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并列为宋代四大金石学家。同样的是，刘跂也是被派往契丹祝贺辽主新年的。一路上，他追随父亲的遗迹，完成着南北通好的礼仪。

在刘摯的故乡码头镇北大约二三里处，刘氏后人为了纪念先祖，出资修建了一座碑亭，取名为“忠肃亭”。亭子呈六角形，正面冲北，里边立碑三座，记载了刘居正、刘摯、刘跂等人的生平事迹。刘摯作为大运河边一位彪炳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，其爱国爱民的思想、廉洁务实的政绩观以及手不释卷、笔耕不辍的学风在今天看来，仍十分珍贵。



地名里的沧州

一场瘟疫与“留欢”村

■纵览

河间沙河桥镇，曾流传着一个有意思的村名顺口溜：“胡周李齐盖，牛杨店孟方，十个官庄加里昌，陈巩孟穆加张王，东西旧馆南北康，小屯谢家陈梁王，说到头没到头，沙桥还有个姜刘，沙河桥为中心，闫家董家小李村。”这顺口溜完整涵盖了当时沙河桥所有村庄的名。其中“陈巩孟穆加张王”，这句话指的就是4个“留欢”村。

“留欢”村名的由来与当时的一场瘟疫有关。元明交接之际是个战乱频繁的时期，一场瘟疫像恶魔般在这片土地上横行。染疫死亡者不计其数，许多家庭都遭受灭顶之灾。然而，在这场灾难中，有个家庭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。

当时，有位魏姓村民以炸油条为业。也许是炸油条浓烈的油烟，又或许是命运的眷顾，当周围的村民纷纷被瘟疫夺走生命时，魏姓人家却独活了下来。这种死里逃生，让他们满心欢悦。于是，他们就把这个村庄的名字改成了“留欢”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陈、巩二姓迁居至此，村庄也随之更名为“陈巩留欢”。明永乐三年(公元1405年)，山西移民孟、穆、张、王四姓迁来，他们分别在陈巩留欢西南侧，建起3座新的村庄。在命名时，他们借助前面村庄名字的一部分，加上自己的姓氏，于是“孟留欢”“穆留欢”“张王留欢”这几个村名就诞生了。

这些村庄的名字就像一部部鲜活的史书，记录着不同家族的迁徙轨迹，见证着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顽强拼搏。每个名字背后都有先辈们的悲欢离合，都蕴含着对生命的敬畏。从魏姓人家在瘟疫中的幸存，到各个姓氏的陆续迁入，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。

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: czwbrw@sina.com